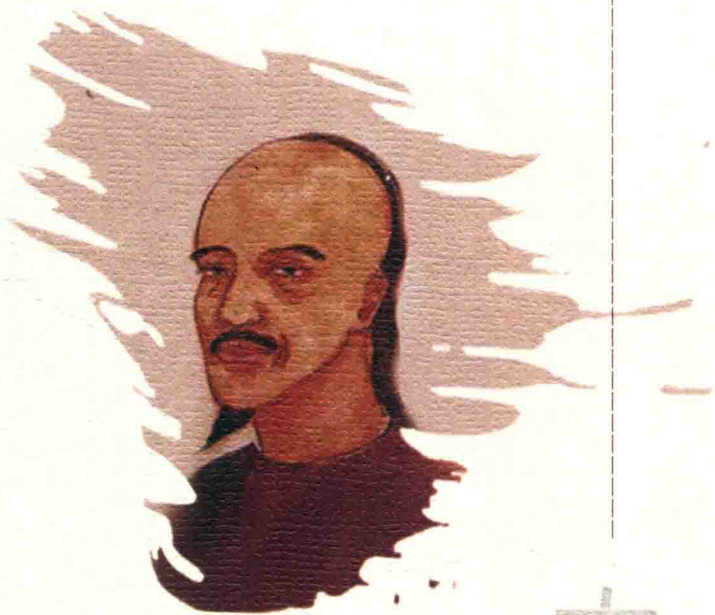


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

张波 著



李颀
Li Yong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李颀

张波 著

大家精要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Li Yong

图书代号: SK16N10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颀 / 张波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1

(大家精要)

ISBN 978-7-5613-8734-4

I. ①李… II. ①张… III. ①李颀(1627—1705) — 传记 IV. ①B249.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2667号

李 颀 LI YONG

张 波 著

责任编辑 郑若萍 彭 燕

特邀编辑 宋亚杰

封面设计 张潇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制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60mm × 98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734-4

定 价 2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销售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3879 传真: (029) 85307864 85303629

丛书编委会

总 策 划：来新国 王文成

编委会主任：郭齐勇 周晓亮

编 委：来新国 陈知涯 张 彧 尹格韬 沈 众
王文成 孟淑贤 周长志 罗养毅 秦 丹
乌 琛

目 录

第1章 艰难涉世 / 001

- 一、幼年丧父 母子相依 / 001
- 二、大志希贤 博览群书 / 006

第2章 熙代学宗 / 015

- 一、通变不迁 阐发新说 / 015
- 二、交友论学 声名远播 / 022

第3章 东行论学 / 032

- 一、丧母别友 群小中伤 / 032
- 二、群贤拥迎 新宰相难 / 036

第4章 南行招魂 / 050

- 一、襄城招魂 泪尽血继 / 050
- 二、会友别行 倡道江南 / 054

第5章 弘道“关中” / 069

一、身居奸藪 矢志不渝 / 069

二、执教书院 力辞征荐 / 075

第6章 隐逸遂志 / 086

一、移家富平 再辞征荐 / 086

二、西返盤屋 隐逸讲学 / 099

第7章 思想主旨 / 124

一、思想渊源 / 124

二、人生本原 / 130

三、悔过自新 / 132

四、明体适用 / 139

五、历史影响 / 144

附录

年谱 / 150

主要著作 / 153

参考书目 / 153

第 1 章

艰难涉世

一、幼年丧父 母子相依

李颙，字中孚，陕西盩厔（今作“周至”）人，出生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正月二十五日。据《重修盩厔县志》载，在李颙出生时其母彭氏梦到天空中响起了数声震雷，或许这种异兆也预示着李颙未来不平凡的人生。

关于李颙的出生地与名字尚存在一些异说，我们可以根据史料略加梳理。《元和郡县图志》称：“山曲曰盩，水曲曰厔。”盩厔因其境内存在诸多山川河流，而且各具萦回的特点而得名。“二曲”乃为盩厔地名的代称，这也是李颙在著述中自署“二曲中孚子”“二曲野夫”等，及学者称李颙为“二曲先生”的由来；据此也可知，《清史稿》云李颙“又字二曲”，实属讹误。此外，在《关中文人传》《鲇埼亭集》《国朝学案小识》等诸多清代典籍中，乃至在某些李颙著述的刊刻本中，李颙的名字又屡屡被易为“李容”，这则因避讳清仁宗颙琰之

讳所致。

关于李颀的家世，现存周至的李氏族谱仅上溯到李颀的父亲李可从。但是，近年有学者推测其远祖为元朝开国功臣蒙古八邻部的述律哥图。述律哥图后传三代至伯颜。伯颜为忽必烈时著名的贤相，歿后被追封为淮安王。伯颜后传三代至李诚，始改汉姓。李诚曾任明朝陕西路都指挥使，居家于盩厔，衍脉至今。到李颀的父亲李可从时，家道已经衰败，但是其先人曾经有过的辉煌功业仍然不断地激励着李氏后人自强不息，建功立业。在光绪末年，临洮李氏祖墓前的石柱上有一楹联“勋著大元此间犹有淮安气，集垂二曲家法仍传周至风”，即将李氏家族中声名最为显赫的伯颜与李颀二人入对，期以怀宗追远，激励后世子孙。

李颀的父亲李可从，字信吾，生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他为人慷慨，喜论兵事，并且以勇力闻名于乡里，人称为“李壮士”。或许是受李氏先人的影响，李可从自幼胸怀大志，具有豪杰侠气，常自叹其才不为世人所知，愿为知己者死。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农民军入河南，连续攻陷了叶县、南阳、洧川、许州、长葛、鄢陵等地，进逼开封。是时，陕西都御史汪乔年奉命督师南讨农民军。汪乔年部监纪西安同知孙兆禄，曾在盩厔做过县令，“素善壮士，欲挟之以行”，便招募李可从从军，署其为材官。汪乔年见到李可从甚为惊奇，甚至许诺“若立军功题授若军职”。李可从深感知遇之恩，义赴这场讨剿农民军的征途。李可从一个妻子彭氏深明大义，善解人意。

临行前，夫妻二人有过一段感人至深的对话。彭氏压抑住内心悲离忧伤之情，说：“吾向虑君无由为人出死力，建奇功，立名当代，不意其有今日，急行毋以妻子恋。”而李可从则感

慨回答：“我此行，誓不歼贼不归。”又说：“战，危事，如不捷，吾当委骨沙场，子其善教儿矣！”在临别之时，彭氏并不是像普通人那样忧离伤感，而是刻意去打消丈夫的后顾之忧，勉励丈夫去建功立业，扬名当代。何况此时机会已经来临，更应该全心去追求，而不应停留于个人的小家庭，自己也完全可以抚养好子女。听到妻子这番话，具有豪侠气的李可从毅然发誓，此行不克敌不会归来。显然，这也意味着，如果讨剿失败，自己必将是血染沙场，杀身成仁，只有关照妻子育子成人。李可从更是挟下一枚牙齿交与妻子说：“倘相忆，顾此如见汝夫。”李可从临别挟齿，告诉妻子看到牙齿就如见到自己一般。话毕，则纵马离去。

讨剿军还未出发，牵挂儿子的李可从又担心李颙为仇人所陷害，便拜托他人寄信与其兄和李颙的舅舅，嘱托他们加以照顾。次年正月，讨剿军行至潼关，李可从再次寄书托付李颙。然而，不久李可从又听说李颙被官府扣押，伤心万状，又立刻寄书与其兄和李颙的舅舅，并让李颙堂兄李居和舅仆彭守己赶至潼关，“欲面有所嘱，朝夕西盼，望之眼传”。但当李居、彭守己到达潼关时，李可从已跟随队伍出关了。可见，爱子情深的李可从，在担心不安中踏上了征途。二月十一日，汪乔年督军于襄城，被农民军团团包围。时逢严冬，雪雨交集，而此时的农民军又是昼夜攻城，李可从深感襄城即将沦陷，与同僚泣语：“出吾门挟齿，誓不与贼共戴！败则遁，毋宁汪公羞乎！”又“深以颙幼弱无依为痛”。李可从告诉同僚，自己在离家时曾挟齿与妻子，发誓不与贼共存！在失败之际，也就是自己杀身成仁之时，决不让统帅汪乔年为之蒙羞；而自己唯一牵挂痛心的是年幼的儿子无所依靠。果然，到了十七日，襄城被攻

陷。此次战役，甚为悲壮！汪乔年被俘，大骂敌军不止，拒不屈服，以致在被割掉舌头后，遭受磔裂致死。李可从则是奋力杀敌，血战巷口，以致体无完肤，但是仍在大呼：“杀贼！杀贼！”当他发现随军的监纪西安同知孙兆禄身陷敌阵时，又奋不顾身跃马奋戈前去相救。然而因寡不敌众，最后与孙兆禄一起壮烈牺牲。李可从阵亡的消息传至盩厔，李颙母子相拥痛哭，悲恸欲绝。彭氏一度打算为夫殉节，幸而得到家人的日夜守视。家人劝阻说：“母殉公夫，以儿如此必殉母；母自处得矣，儿且殉，李氏绝也。”至此，彭氏才打消了殉节的念头。是年，李颙十六岁。

或许因为李可从生前不善于经营，家境相当困窘，常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在李可从歿后情况更为可悲：李颙家已连寸土的产业都没有了，只能租赁他人的小屋居住。然而，不久后因为无法缴纳房租而遭到驱逐，全家人只好东移西徙，流离失所半年有余，后来才在邑西新庄堡的一间茅草屋中定居下来，但是窘困依然如初，甚至为了换些食物，李颙不得不将家中唯一的一张桌子拿出去卖掉。面对如此穷困的家境，母子二人常常是“茕茕在疚，形影相吊”。在这种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母亲彭氏成为少年李颙生命中唯一的精神支柱和牵挂。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杰出的母亲，但是能够流芳于世的却寥寥可数，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战国时期孟子的母亲与南宋时岳飞的母亲。孟母“三迁择邻”“断机教子”，将孟子培养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家“亚圣”；岳母则以刺字诫子立志报国，将岳飞培养成著名的民族英雄。在历史上，虽然李颙的母亲没有孟母、岳母那样脍炙人口，常被人津津乐道；但是李母彭氏不仅具有孟母的贤德，善于教子；也具有岳母的民

族气节，识得大体。当时有好心的乡邻可怜李氏母子生计艰难，常常是灶无生烟，朝不保夕，便劝李颺效仿其他人到县庭里充当门役，做些杂活，补充生计，这样也可以使其母亲免受饥寒的折磨，但是遭到李颺的拒绝。李颺认为：“人子之事亲必以道，不以其道，虽万钟罪也。况给事县庭，何事不辱母乎？吾以辱母，吾不为也，吾母亦不令我为也。”在李颺看来，儿子侍奉父母应当坚持正道，如果不坚持正道，即使获得优厚的俸禄，也是不可取的。何况让他供事于县衙，做下等的役吏，这将使他的母亲感到羞辱？他绝不会为了一两顿饭菜，做出让母亲感到羞辱的事，母亲也不会让他这样做。果然，当彭氏听说此事后，不同意李颺去县衙做事。在李母看来，李颺的父亲死于王事，是慷慨就国难，死得其所，是英烈之举。而李颺也应当效仿其父立身行道，光大先人的英烈气节，而不能因暂时的贫穷饥寒去做下等杂役之事。乡人又劝导李母改嫁，这样可以保全母子的性命。李母流泪谢绝，毅然持志守节，坚持靠着日夜艰苦纺织、为他人缝纫等，换些粮食来维持生计。在李母看来，真正能够光显荣耀的并不是外在丰厚的物质财富，而是能守持大节，这才是流芳万世的荣显。因此，李母常常勉励李颺读书明理，师法古人，要有大的理想，不必以习制举业谋取一时的富贵功名；并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来为儿子的读书提供力所能及的条件。因此，有人评论说：“二曲先生之贤也，由其有贤母而乃以有成也。”事实上，李母因其贤德，在其生前即有官员以“芳追孟母”赞誉之，歿后也被赐书“贤母彭氏”以表其墓，甚至陕西总督鄂善捐俸特为她建了“贤母祠”。

李母的志操言行深刻影响了李颺的成长，所以李颺晚年回

忆其少年经历时，说：“迨颺成童，乡人悯其嫠（jù），甚或劝之给事县庭，或导之佣力于人，谓可以活母命，免沟壑。先慈咸拒谢弗从，朝夕惟督以诵书、修己砺行为务。颺所以不至失身他途，堕落于小人禽兽之归，皆颺母之贤，有以成之也。”在母亲言传身教下，李颺一生矢志读书明理，效法古人，终成为一代大儒；同时，坚持操守气节，淡泊名利，威武不屈，贫贱不移，时人又称其为“隐君”。

俗话说“寒门出孝子”。在长期的清贫生活中，李颺一生笃行孝道，爱敬母亲。据记载，一次李母身患痢疾，李颺遍延医生诊视，每夜祈祷期望代母受过；并且跪接粪便，以粪便的轻重来判断母亲的病情：轻则喜跃进食，重则伤心哭泣。因此，时人又称李颺为“李孝子”。

二、大志希贤 博览群书

古往今来，大凡取得伟大成就的人，多是在青少年时期就立下了远大的志向。志向如同黑夜中辉煌灿烂的灯塔，指引着大海中航船的方向。在李母的教导之下，李颺自幼就有了强烈的读书愿望，并在读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远大的志向。然而，在李颺的青少年时期，志气和贫困又常如一对患难兄弟，紧密相伴。李颺的立志成学之路是异常艰辛的。

由于家境贫困，李颺在九岁时才入小学，跟随塾师学习《三字经》，但是聪明好学的李颺天生具有探问究竟的思想家气质。在接触到《三字经》首句“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时，他便私下请教学长：“既然人性天然是善的，为何又说‘相近’呢？”李颺的这一疑问，不仅涉及中国古代思想

家常常探讨论辩的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揭露出南宋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在撰写《三字经》时所使用的文字欠缺周密性。事实上，在儒家学者中也不乏少年时就具有探问究竟的典例，如南宋的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象山，世称象山先生）“三四岁时思天地何所穷际？”明代的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十一岁时便问塾师“何谓第一等事？”从探问究竟的品性看，李颺与陆、王是何其相似！或许这也预示着李颺未来将和陆、王一样成为一代鸿儒。显然，李颺的疑问并不是一般的少年学子能够理解解答的，其学长当然也无以应对。然而，或许因为家贫无法获得足够的营养，李颺自幼身体羸弱，疾病不断，仅在小学学习了二十天左右便不得不因病辍学。其后，虽然李颺又跟随其舅父学习《大学》《中庸》，但是旧病仍不时发作，李颺的学习也是时断时续。就是在这时断时续的学习过程中，李颺不仅掌握了初步的学习技巧，打下了自学的基础；而且通过对《三字经》《大学》《中庸》等典籍的初步理解，其精神素质得到极大的涵养，并且在平日生活中展现出一种超乎常人的志节操守、风度仪表和才气识见。

崇祯十六年（1643），流离失所的李颺母子刚刚定居于新庄堡的茅草屋，驻防在当地的军队突然发生了兵变，杀掠事件不时发生。一天，李颺外出拾柴，遭遇到乱兵，便被俘获，“刃将及颈”，但是此时有“同伍异其气概，亟格刃获免”。两年后（清顺治二年，1645），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当时有贺某率领农民军围攻李颺所居住的新庄堡，新庄堡即将沦陷，“堡人震怖悲号”，而此时的李颺却镇定自若，神情如常。在以上事件中，李颺是何等的气概不群！若没有超乎常人的志节操

守与才识风度，一个尚未弱冠的羸弱少年绝难做到身处乱兵流寇之中泰然处之，从容不迫。这也令目睹后一件事的鄜州左之宜惊奇不已，敛衽起敬，并赞誉说：“吾生平足迹半天下，未尝见此子！丰标既伟，才识又卓，真世间之杰也！”左氏以“世间之杰”赞誉李颀，实恰如其分！在生死之际能镇定自若，这也是其人格中所蕴含的浩然正气所致，当然也是常人望尘莫及的。左氏见李颀家境贫困，“又赠之以金”，而李颀却谢而拒绝。这更令左氏大为惊叹，逢邑人便相告：“汝邑有‘生知’之人，不经师匠，自奋自成，汝知之乎？”而听到的人却愕然不知左氏所道是谁。

上述两件事情主要是展现李颀的风度与操守。少年李颀为何具有上述不凡的风度与操守呢？这或许是其父母的影响所致。李颀的父亲有“壮士”之称，具有顶天立地的“豪杰气概”；而其母亲注重气节操守，矢志不渝，是位贞烈女子。李颀耳濡目染，不学则能。但是当我们考索史料时，可以发现李颀的风度与操守也是他卓尔不群的鸿鹄之志的展现。少年李颀在读书明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大志希贤”的志向与抱负。据李颀弟子惠麓（音“隆”，雷声）嗣所撰的《历年纪略》记载，在顺治二年，樊嶷到盩厔任县令。樊嶷字疑山，山西平阳贡生，曾经跟随明末著名学者辛复元学习，倾心儒学。在盩厔主政期间，樊嶷礼贤下士，慈良爱民，有古代循吏的风范，但后来遭受他人谤讪而离任。樊嶷到任一年后，便听说李颀好学，即想与之交游，便遣小吏前去延请。面对樊嶷的延请，李颀却以“庶人无入公门之理”为由加以辞绝。樊嶷当即辞退马车，延请李颀至家中。是时天气亢旱酷热，而李颀却身无别衣，穿着褴褛絮袄、毡袜破履，但是李颀眉宇之间所呈露

出的轩昂气质，及其潇洒的襟怀、离尘拔俗的君子言行，让樊嶷惊奇不已。二人相与论学，樊嶷不觉从内心油然折服。在互相辞别之后，樊嶷即赠送李颀一块“大志希贤”的匾额加以表彰，并兴奋地作诗说：“漫道高贤不易逢，而今此地有潜龙。英年独步颜曾武，定识遥承孔孟宗。浊世狂澜堪砥柱，俗儒圭角已陶镕。千秋声气应还在，濂洛关闽岂绝踪。”后来樊嶷在离任之前，又致信李颀说：“昨晤吾子，知吾子必为大儒无疑也。幸陈人有缘，得一见之；怅陈人无缘，将不得常常而见之。虽然声气自在，一日亦千古也，喜甚，快甚！担当世道，主持名教，非吾子其谁耶？区区行且拭目以望矣！”樊嶷对李颀的赞誉乃是一位儒家学者内心真诚的感发，并非是过高之评。樊嶷当是李颀遇到的第一位知音，二人也自此订交。后来，李颀撰成第一篇充分展现其思想的重要文章——《悔过自新说》后，便延请樊嶷为之作序。

事实上，“大志希贤”也是青年李颀，乃至是其一生守持的儒家志向与信念；也是以这种信念为支撑，李颀的萧然风度、“豪杰”气概更能彰然于世。樊嶷以“大志希贤”“必为大儒”“担当世道，主持名教”等言论赞誉李颀，不仅是基于李颀长期以来刻苦求学、博览群书的实际情况的感发，也是一种远见卓识——日后时人将李颀与孙奇逢（1584~1675，字启泰，号钟元，世称夏峰先生）、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世称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并称为清初“三大儒”。与同时期的孙奇逢、黄宗羲相较，李颀的成学经历俨然没有二人的家学或师学传统，主要是靠自学成才，显然其中的艰辛要远远超逾二人。尤其是在父亲去世后，李颀的家庭更为窘困，但是李颀读书之志却愈加坚定。一次，有算卦人见李颀可怜而

想传授其卦术以帮助其谋取生计，但是当李颺途经社学听到其间传出的琅琅读书声时，心中便黯然有所感，立刻打消了学算卦的念头，返回家中矢志读书。然而，毕竟困窘的家境无力支付学费，甚至连舅父的私塾也不愿意接收他。正当李颺“退而自伤”、徘徊犹豫之时，李母便鼓励他说：“无师遂可以不学耶？古人皆汝师。”母亲的话使李颺豁然醒悟，古圣前贤不就是最好的老师吗？于是李颺奋然自学，并按照古代私塾常采用的教学进程——“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取出过去所读的《大学》《中庸》，依稀辨认，深入理解与体悟。进而，李颺又去自学《论语》《孟子》，遇到疑问便逢人问字正句。为了支持儿子读书，李母则“为人纺棉，得米则杂以糠粃野蔬，并日而食”；而李颺也在“拾薪采蔬之暇，手不释卷，书理不解，则愤悱终日”。后来又有亲友送给了李颺一本《篇海》。《篇海》是古代著名的字典，收录了大量的字，对李颺的识字起到了很大的帮助。李颺在读书的过程中可以随读随查，于是李颺识字逐渐多广，书理也随之逐渐通畅，又经过自己的“熟读精思，意义日融，然后递及于经”。李颺的刻苦自学，令乡人甚为诧异：家庭已贫寒如此，连维持生计都不容易，却能读书明理，锲而不舍。因此，不久李颺便得到乡人“奇童”的赞誉。

随着坚持不懈地读书，在李颺十九岁时已经读完了《周易》。这一年（顺治二年），李颺又偶然得到周钟所撰的《制义》。周钟是明崇祯时期的进士，当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周钟因上《劝进表》获得检讨的官职。明永乐以来，在科举考试中将八股文作为唯一文体，每篇文章都要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文章的语言要讲

究声偶、对仗。这种格式上的排偶叫“制义”。《周钟制义》乃是以八股文写作的文章，在明末影响甚大。李颀见其中阐发义理透彻明晰，尤其是言及忠孝节义时，慷慨悲壮，便尤为喜爱，流连玩摹。李颀每模拟《制义》撰写成一篇文章，均令人惊叹不已。然而，周钟在《制义》中大谈忠孝节义，自己却背节弃义。后来李颀听说周钟不能持守志节之事时，十分气愤，愤怒地将过去的模仿之作付之一炬，“以为文人之不足信、文名之不足重如此，自是绝口不道文艺”。是时，又有县学左君勉励李颀去应试，考取功名，李颀则笑而不答。在李颀看来，“昔人谓大丈夫一号为文人，便无足观。若以诗文而博名谋利，仆仆于公府，尤不足观矣”。《制义》等时文、文艺都不能真正关乎经世致用，培养出的多是功名利禄之徒，是“俗学”。

李颀的这些看法和日后成为好朋友的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更名炎武，字宁人，世称亭林先生）不谋而合。顾炎武说：“《制义》初行，一时士人尽弃宋元以来所传之实学，上下相蒙以饕禄利而莫之问也。”又说：“八股之害等于焚坑，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秦始皇焚书坑儒也不过活埋了四百余人，而明王朝以科举取士录用的禄利之徒又何止四百啊！行蝇营狗苟之举，不务经济之学，误国误民者更不乏其人！也是在这一年，李颀在摆脱《制义》的束缚之后不久，便开始借读《春秋》三传、《性理大全》《伊洛渊源录》等书。在研读过程中，李颀从内心深处体会到宋代理学家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后改名敦颐，世称濂溪先生）、程颀（1032~1085，字伯淳，世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张载（1020~1077或1078，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朱熹（1130~